



作家的童年

15

● 陈学昭

● 谢璞

● 赵景深

● 方敬

年 文 库

作家的童年

15

新 蕾 出 版 社

《童年文库》
作家的童年^①

•

新蕾出版社 编辑、出版
天津新华印刷一厂 印刷
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4.75 插页6 字数98,000

1984年7月第1版 1984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5,900

统一书号：R10213·232 定价：0.63元

编 者 的 话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。今天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幸福地度着自己童年的小朋友们，一定想知道那些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做出了贡献、增添了荣誉的叔叔、伯伯、阿姨是怎样度过他们人生的第一阶段——童年的。他们是不是也象我们一样无忧无虑地学习和游戏？为了满足小朋友们的要求，我们编辑了这套《童年文库》，目的在于用朴实的文笔、生动的形象向小朋友们介绍我国当代的作家、艺术家、科学家、体育冠军和其他著名人物童年时代的生活故事，使小朋友们从中得到教益和启迪。

《童年文库》包括《作家的童年》、《艺术家的童年》、《科学家的童年》、《冠军的童年》等丛书。《作家的童年》收有我国当代作家撰写的回忆他们童年生活的文章。这些文章除个别已去世的老作家由别人代为整理外，均由作家本人用第一人称写成。在每篇文章前，都附有作家的照片、手迹、简历和主要著作，使小读者们见人、见字，了解作家的历史和著作，读起他们的文章来更加亲切。

本丛书拟分若干集出版，每集约八——十万字。

在编辑过程中，我们得到了中国文联、作协和各省市自治区文联、作协分会的鼓励和支持；许多作家对我们的工作给予

热情的帮助和关怀，在这里，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。

本集收入作家陈学昭、赵景深、谢璞、方敬撰写的童年回忆。

新蕾出版社编辑部

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于北京第四次文代会



一九二八年在巴黎



延安的秋 陈学昭

延安的秋，严肃，
象一个出征的青年，威武、雄壮。
披上战袍
夜，静穆。
风呼叫，
象战号！

“延安的秋”的第一节，共三节。原载于一九三八年第一卷第二期“文艺突击”。

陈学昭

目 录

回忆我的童年	陈学昭 (3)
我的学问是怎么来的	赵景深 (8)
美妙的夜空	
——回顾我的童年	谢 璞 (12)
童年琐忆	方 敬 (115)

陈学昭的简历和主要著作

陈学昭，1906年4月17日出生于浙江海宁县北门外陈家埭。七岁读私塾，九岁读县立女子高小，十五岁入南通县立女子师范，受“五四”运动的影响，于1924年初在上海《时报》上发表了处女作《我所希望的新妇女》，是文学团体浅草社的发起人之一。曾先后在《妇女杂志》、《新女性》、《语丝》文学周刊等刊物上发表文章。1927年5月赴法国学习，接着任天津《大公报》驻欧特派记者。1928年10月曾回国一次，1929年再次赴法国学习，获得克莱蒙文学博士学位。1935年2月回国。1938年至1939年在延安，1940年至1945年再次到延安，参加学习和工作。后任《东北日报》四版主编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参加过土改、民主反霸、互助合作等运动；从事专业写作。曾任浙江大学党支部书记、中国作家协会理事、浙江省文联副主席等职。

主要作品有：散文集《倦旅》、《寸草心》、《烟霞伴侣》、《忆巴黎》、《漫走解放区》、《延安访问记》、《海天寸心》、《野花与蔓草》；长篇小说《南风的梦》、《春茶》、《工作着是美丽的》和《工作着是美丽的》续集；中篇小说《如梦》、《土地》；短篇小说集《新柜中缘》；文学回忆录《天涯归客》、

《浮沉杂忆》，诗集《纪念的日子》。

翻译作品有：中篇小说《阿细雅》（俄国屠格涅夫著）；理论文集《列宁与文学及其他》；剧本《伏德昂》（法国巴尔扎克著）；童话集《鲶鱼奥斯加历险记》、《〈哔一啪〉及其它故事》。

回忆我的童年

陈学昭

我在六岁又六天就失去了父亲，有四个胞兄。第二个哥哥执行父亲的遗嘱，让我念书。我七岁进了设在近邻同姓人家的私塾。书房是一间小小的客堂，里面摆着老师用的桌、椅。学生们用的小茶几和小方凳，都是从自己家里搬去的。私塾老师年纪大了，教我们念一遍书（无非是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之类），也不多做解释，就伏案打瞌睡了。这时，有的顽皮男孩就溜到书房外院子里去玩儿了。私塾只上半天，下午在家温习。

在家里除温习功课外，还要学习写字，先要学写正楷，然后才能学写草体字，一张又一张，不知写了多少，可我草体字一直没有学好。到了夜里，我和母亲同床，一头睡。母亲识字，她给我讲一些历史故事、民间传说：花木兰从军呵，越王勾践带领许多兵士对着钱塘江的大潮射箭呵，乾隆下江南呵……这样的夜晚是我最幸福的时刻。

九岁，我进城里的小学念书，这时已男女同学。同级女同学连我只有四人。从这时开始，每天早上进城上学，要走好长一段路，我家在北门外平安桥进去的乡间——陈家埭。从家里出发，要经过两边是些桑树，行人很少的一条小路，小路转弯，是一份人家的坟墓和密密的树林。在树林深处，曾不止一次地

发生过抢劫和凶杀。过了这座坟墓和密林，是一块不小的河池。人们在河边提水，妇女在河边洗衣。可是自从发现一个年青妇女的尸体从水中浮起来，提水、洗衣的人就少起来了。走完池边的小路，再拐个弯，望见了平安桥，于是转入进城的大石板路。走这一段路，我总是带着恐怖的心情，逢到天下雨，更加不安，因为道路泥泞，走不快了。有时遇到邻居家的孩子到平安桥头去干什么事，可以同个伴，就很高兴。我把午饭带到学校里，很简单，一小碗饭，加上点菜，托学校里的小厨房师傅帮忙蒸蒸；有时，托蒸饭的同学多，我轮不上了，就讨点开水泡泡吃了。

进小学后，功课多了，除国文外，还有历史、地理、算术。历史、地理，我不害怕，但算术却是第一次正式学习，而我又是插班生，没有打好基础，脱了节。小学里的几位老师都很热心教导学生，但不知为什么我见了这些老师都害怕的。大约他们已看出我的毛病来了。算术老师托一位算术极好的男同学帮助我，辅导我，这位男同学把他的算术作业本借给我看，有时也讲几句给我听。当时虽然男女同学，但男女同学间根本不打招呼的。我的算术总是跟不上，二哥当然是清楚的。他对我的算术抓得特别紧，笔算还要加上珠算，要是算错了一点，他不但训斥，有时还用戒尺打我的手心。因此，每逢他给我温习算术，我就害怕，越害怕越回答不对。后来，我甚至憎恨算术了。每次暑假、寒假考试，算术总是不及格，可是由于我国文、历史、地理考得好，平均分数还是高的，所以没有留级。从那时起，我越来越爱好国文和历史。国文老师是位上了年纪的老先生，他很耐心地教我们。有个别坐在后排的男学生，不专心听课，他并不呵责，但是在他讲解了一遍后，常点名叫学生站起

来讲解，当点到这个顽皮不专心学习的学生，可真使这男学生为难了，他一句也讲不出，非常难为情，后来，这个男生改变了，用心听课了。

虽然是男女同学，但体操课女生不参加。遇到上体操，我们同级的女生，有时去操场站在一角看男生做体操，或者，四个人在教室外边踮脚。小学只念了两年，但在我的记忆里还留着深深的印象。每当哥哥们不在家的时候，我就悄悄地阅读一些课外的书。二哥知道我欢喜看书，这是瞒不过他的，他对我看书，有不少清规戒律：《红楼梦》、《水浒》、《西厢记》、《儒林外史》……是不准看的；准许我看的有《纲鉴易知录》、《资治通鉴》、《昭明文选》……。我家从祖父起藏有一些书、画，只是我从来看不到，每年晒书的时候，哥哥们不准我翻看，叫我走开。我只知道有的好版本书藏在楼上隔墙里，差点的版本放在中堂后边一间屋的木箱里。但是不管二哥准不准我看，通过母亲的各种帮助，我还是能看到的。

小学毕业后，我进入女子高小，仍是早出晚归，午饭带到学校里去吃。女高小的校长是一位女教师，她已近四十岁，没有结过婚，听年级高的女同学说她不愿结婚。她担任我们的国文教师，从她的讲课和平常的说话里，觉得她有进步思想，主张男女平等。她全心全意主持这个学校。我们的历史教师也是女教师，她精通历史，有问必答，年纪不小了，也没有结婚。我的功课，依然是算术跟不上，在家里，二哥还是抓得很紧。对于算术，我已失去了信心，觉得应当尽力学习自己所欢喜同时也有用处的功课。这时候我不只是欢喜读《昭明文选》，而且极爱读《史记》，有的篇章，我能熟背。对于二哥的训斥、处罚，我一点不反抗，当然我还是想把算术学好一点的，无奈

实在没有兴趣。

1919年“五四”爱国运动爆发的时候，我记得是在女高小二二年级。我们女同学都组织起来，到街上去宣传，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，劝商店里抵制日货，劝人们不要买日货。各界纷纷响应，商店接着罢市。反动的县政府为了威胁抗议的老百姓，镇压学生运动，有一天竟把一个犯人杀掉，将他的头挂在城门上。但是老百姓和年青学生们并不害怕，罢市继续着。我每天从陈家埭上女子高小，要从这城门下经过两次。从这时起，我觉得我们这些女青年学生都挺起腰，站直了。反动的县政府无法对付学生运动和罢市，只得把挂在城门上的人头拿掉，悄悄地收场。

过了一年，我从女子高小毕业，这时我十五岁。我的童年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过去的。当时我读了一点书，但由于自己太幼稚，又得不到很好的辅导，谈不上有什么收获。“五四”运动给了我大震动、大启发和大教育，使我在四年之后，用笔名写出第一篇东西《我所希望的新妇女》，刊登在1924年新年的上海《时报》上。

1983年5月16日杭州

赵景深的简历和主要著作

赵景深，字旭初，曾用笔名卜臙胧、冷眼、陶明志、博董、露明女士、邹嘯露等。1902年4月25日生，1922年在天津棉业专门学校纺织科毕业，后刻苦自学文学。历任岳云中学、长沙第一师范国文教员、中国公学、上海大学、艺术大学、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教授。1927年任开明书店编辑。1930年起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至今，同时兼任北新书局总编辑到1951年。主要著作有：文学论著《文学概论讲话》、《文学概论》、《中国文学史概要》、《中国文学史新编》、《中国小说论集》、《小说论丛》；民间文学论著《童话概要》、《童话学ABC》；翻译作品有《罗亭》、《柴霍夫短篇杰作集》（八卷）、《格林童话集》十二册、安徒生的《月的话》、《皇帝的新衣》、《柳下》等；创作有小说集《梔子花球》；诗集《荷花》；散文集《小妹》、《琐忆集》、《文人剪影》；其它著作有《读曲随笔》、《大鼓研究》、《弹词考证》、《弹词选》等。解放后出版的著作有：《元人杂剧钩沉》、《元明南戏考略》、《明清曲谈》、《明清传奇选》（与胡忌合编）、《读曲小记》、《戏曲笔谈》，并选编有《鼓词选》、《古代儿歌资料》等。

我的学问是怎么来的

赵景深

有些小朋友问我：“赵爷爷，我们常常看到《儿童时代》上您校订的儿童古诗，我们很想知道您的学问是怎样得来的。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您小时候的事？”这一问，使我回忆起许多童年的往事。

我是1902年生浙江兰溪县的，父亲是个国文教员。五岁那年，我家搬到安徽芜湖来住。我进了芜关小学读书，它的前身是一个清朝的考场，每间屋子都挂着“天字号”“地字号”的牌子。那时，老师仍用打手心来惩罚学生，有一次我被打了一下，手心立即肿了起来。

辛亥革命以前，我们无论男孩还是女孩，都穿长衫，扎辫子，念的是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之类。那里头究竟讲的什么，我们根本不懂，老师要我们背，我们只得“之乎者也”地瞎背一通。

辛亥革命后，我和其他男孩一样剪去长辫子，虽然还不太理解剪辫子的意义，但都有一种轻松、自由的感觉。

这一年，孙中山先生来到芜湖，芜湖群众开大会欢迎他。我写了一篇稿子，经父亲修改后，在欢迎大会上演说。我当时只有十岁，个子又矮，还要人抱我站到当中的一把椅子上。名

义上是演说，实际上是背诵着那篇短稿。台下的群众大为欢迎。

我忘不了就在那一年，芜湖城内军阀混战，我跟父母坐着小船到离城十余里的濮家店去避乱。乡间十分幽静，那儿的河流特别多，我们的住处门口便是一条直通城里的河。父亲常带我到田野和河边去走走。我睁大眼睛，看啊，看啊，恨不得把一切新鲜的事物都印在自己的脑海里。一次，我们经过一条小河，看见水鸟把河里的鱼吞下，接着又乖乖地把鱼吐到船舱里。我好奇地问父亲：“这是什么水鸟？”父亲说：“这叫鸬鹚。”我获得了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，心里别提多高兴了！父亲还带我去乡下的茶馆，在那里，我看到了辛苦的农民和各种各样的人。这段乡间生活，使我明白一个道理：只要留心周围的事物，那么到处都是学问。

第二年，我转学到芜湖圣雅各小学念书，喜欢看戏，演戏。每逢暑假，母亲就带我到宁波外婆家去。那儿有个城隍庙，庙里有许多泥菩萨，戏班子常在里面演出。这庙很大，有三个戏台，有演京戏，也有演徽戏的。看这种戏不要买票。戏台下还摆有小摊子。我常买些零食，边吃边站着看戏。当我看到《武松打虎》的精彩场面时，几乎兴奋得跳了起来。后来，我在中学教书的舅舅也常带我到戏院去看戏。我渐渐被戏迷住了，就把节省下来的钱买了四十本专门登载唱词的书来看。一天，舅舅捏着胡琴对我说：“你喜欢京戏，我教你唱吧！”我一听，咧开嘴笑了：“好，咱们现在就唱。”舅舅一跺脚，我就咿咿呀呀地唱开了。起初，我不懂什么调子，在舅舅的帮助下，我渐渐唱得好了起来。那时，我学唱的都是《空城计》、《李陵碑》一类古戏，它们对我影响很深，使我对戏曲产生了

浓厚的兴趣，这也是我后来专门从事戏曲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。有一年芜湖闹水灾，街上成了河，当中搭起一连串长长的跳板，两旁好多洗澡盆当小船用。武昌文华大学学生为了救灾，在芜湖演戏募捐，他们知道我会演话剧，就把我找去了，要我扮演男孩子和女孩子。我们把卖票得来的钱全部捐献给灾民。

由于我喜欢看戏、看书，爱观察生活，也就喜欢写文章。有位崔老师，思想比较开通，常布置“富国强兵”之类的题目，给我们作文。平时我常看报纸的社论，学写这样的文章可带劲了。当时作文写得好的，要抄出来，放在一个玻璃匣子里，让全班同学来抄。这叫“登瓮子”。那时我的作文几乎篇篇“登瓮子”。

我在十二岁时，就喜欢阅读儿童杂志，《童话》、《儿童教育画》和《少年杂志》等，都是我的好伙伴。十五岁那年，我就翻译了包尔温的一篇《国王与蜘蛛》，投给《少年杂志》，给刊登了出来；接着又写了一个我听来的故事《小孩和蜗牛》以及《对角棋》，也在《少年杂志》上刊出。后来我到了天津，陆续翻译了《火绒匣》、《皇帝的新衣》、《白鸽》（现译为《野天鹅》）等安徒生的童话，都在《少年杂志》上刊出。我不但自己写文章，还喜欢作编辑工作。我和几个同学模仿《少年杂志》，也办了一个小杂志。别人办刊物有铅印，油印，我们都是手抄的，写文章也是这么几个人，每期只有一本，大家互相传阅，同学们幽默地称它为“肉报”（意思是手抄出来的）。

我讲的这些，都是六十多年以前的事了。你们别以为我是什么神童，我能演戏，做文章，都是我认真读书，仔细观察生活得来的结果。